

隋唐宝相花纹样及其演变

□ 胡良仙

前言

古代金银玉石器物上的纹饰,是古代社会艺术理念和流行时尚的一种物化遗存。纹样学内涵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断代分期研究的课题之一,而且在文明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相关研究领域也都占有一定地位。

隋唐宝相花纹样是隋唐时期最受人们喜爱的一种装饰纹样,它广泛应用于金银器、玉石器、铜器、漆器、墓志、织锦、绘画、石窟寺以及建筑装饰领域。

宝相花纹样是人们艺术升华之后的一种图案纹样,它构图艳丽、雍容华贵,是自然美与理想美成功结合的典型范例。它丰满繁盛、舒展大气,蕴涵着大唐帝国的恢宏气概和充沛活力,体现着大唐帝国自信与华贵的气质。

在隋唐考古学研究日趋深化的今天,宝相花纹样的排比研究已逐渐引起学界专家的普遍关注,但是在宝相花纹样的认知上还存在诸多差异。本文拟就目前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情况及认知差异,撮其要者,归纳成文,并就宝相花源流及演变轨迹,提出拙见,望学界师友,不吝赐教。

宝相花纹样的界定问题

宝相花一词在考古报刊上已有数十年使用历史,一些发掘简报经常将墓志纹样、金银器纹样定名为宝相花。它们的界定往往各有标准,有的将雍容华贵、圣洁高雅的莲花形装饰图案统称为宝相花,有的将一些有特色的莲花称为宝相莲花、宝相牡丹花或缠枝宝相花。但在仔细翻检原文时,又会发现文中对宝相花的称谓似各有标准,说明在宝相花纹样的界定上尚存在明显差异。

薄小莹博士在《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1]一文中,对宝相花纹样作了初步确定,她认为宝相花一般应包括四个基本元素,包括花瓣勾卷、莲花造型以及云朵纹、忍冬纹等。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齐东方教授在《唐代金银器研究》^[2]

专著中,对宝相花有更深刻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徐殿魁先生在《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3]一文中,将宝相花界定出四点要素。归纳以上学者成果,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共识:

1.宝相花纹样是一种模式化图案,它只限于平面构图,可以有层次但决无实际花朵的质感。

2.整体花形为六出莲花或八出莲花,用莲瓣组成花朵轮廓线。

3.每一莲瓣的外轮廓用两片对卷忍冬叶勾勒出尖角花叶。

4.花心部分融进中国传统云气纹或勾卷的云朵纹,使图案活泼而富于变化。

5.花心写实更接近牡丹花、石榴花,力求艳丽而蕴涵深远。

以上五点,对于盛唐时期的宝相花来说,应该是界定清晰,认知没有太大争议的。

宝相花纹样的演变轨迹

当我们认定宝相花纹样是一种抽象的、模式化的装饰图案,那么我们有理由确信它的形成过程必然是不断将美的理念融入到花形的基本要素之中,从而使这种装饰图案达到一种意象升腾、美仑美奂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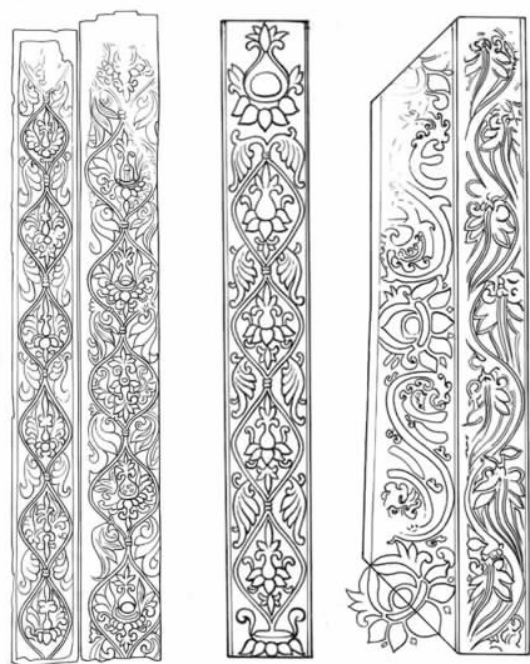
经过对宝相花纹样系列梳理和相互比对,我们初步认为宝相花纹样经过形成时期、鼎盛时期和衰变时期三个阶段。

1.形成时期

从历史背景上观察,宝相花纹样是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而形成的,这种以莲花为基调的图形应形成于北齐,年代大约在公元16世纪。试举几例:

例一 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4]

娄睿墓位于太原市西南郊的王郭村,以其二百平方米精美北朝壁画而享誉学界。在砖室墓的石门边框上,细密凿刻着双行图案(图一)。特征是缠枝忍冬纹构成起伏波浪轮廓线,在波浪纹中间勾勒图形,主题是一幅幅莲瓣图形,莲瓣中饰有忍冬叶、摩尼宝



图一
娄睿墓
石刻宝相花

图二
徐显秀墓
石刻宝相花

图三
虞弘墓
石刻宝相花

珠和云气纹。这种蕴涵深邃、十分艳美的图案纹样，与宝相花标准图形十分贴近，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宝相花纹样的初始形态。

例二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5]

徐显秀生前封为北齐武安王，与皇族关系密切，北齐武平二年(571年)下葬于太原北郊郝庄乡王家峰村。该墓同样以百余平方米北齐墓内壁画而引起学界关注，在砖石墓的石门边框上同样雕刻了对称的竖行图案。先用缠枝忍冬勾纹勾勒出波浪起伏的图案轮廓，主题图案是忍冬叶、摩尼宝珠、莲瓣纹和云气纹等(图二)，将其视为宝相花的初始图形应该是理由充足的。

例三 太原虞弘墓^[6]

虞弘墓位于太原市西南郊的王郭村，与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毗邻。虞弘为鱼国人，生前曾在北齐、北周、隋三个王朝任职，墓内出土汉白玉石椁以精美的艺术雕刻名扬海内外。虞弘下葬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年)，虞弘夫人下葬于开皇十八年(598年)。虞弘墓出土的一套精美石刻墓志，志盖四刹阳刻剔地宝相花。轮廓纹饰为对卷忍冬叶，下衬大莲瓣纹座，中心部位摩尼宝珠，宝相花周边用缠枝忍冬纹装饰(图三)。

类似图象还可见太原市花塔村出土的北齐释

伽坐像^[7]，释伽佛趺坐于仰覆莲花座之上，头后雕花头光，头光雕刻莲瓣纹、摩尼宝珠和缠枝忍冬纹，颇具宝相花意象，只是雕刻略显粗犷。

显而易见，以上四例虽不能确指它们就是宝相花图形，但与宝相花构成元素多处相同，我们认定它们属于宝相花形成时期，当不会有太大谬误。

2. 鼎盛时期

根据唐代金银器、石窟寺、绘画、丝织品、墓志、铜镜等主要纹饰排比，盛唐时期无疑是宝相花最成熟时期。时间约在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也就是武则天至玄宗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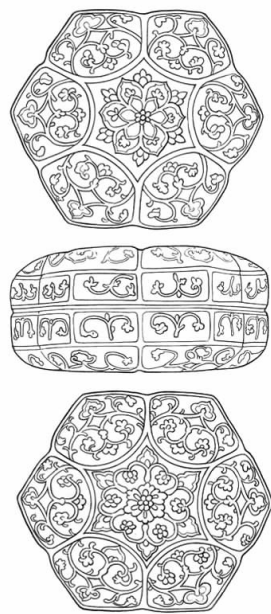
例一 山西万荣唐薛徽墓石椁宝相花^[8]

唐薛徽为太平公主女婿薛绍之堂弟，下葬于唐开元八年(720年)，石椁外线刻宝相花极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主题图案由缠枝莲花纹构成大莲瓣，中部又有大中含小的两个海石榴，小石榴顶部莲花初开，大石榴顶端牡丹怒放。再往上的大莲瓣由莲座、鸳鸯、鸳鸯口中所衔的一串摩尼宝珠和云朵纹组成。整个图案气势如虹，意趣盎然(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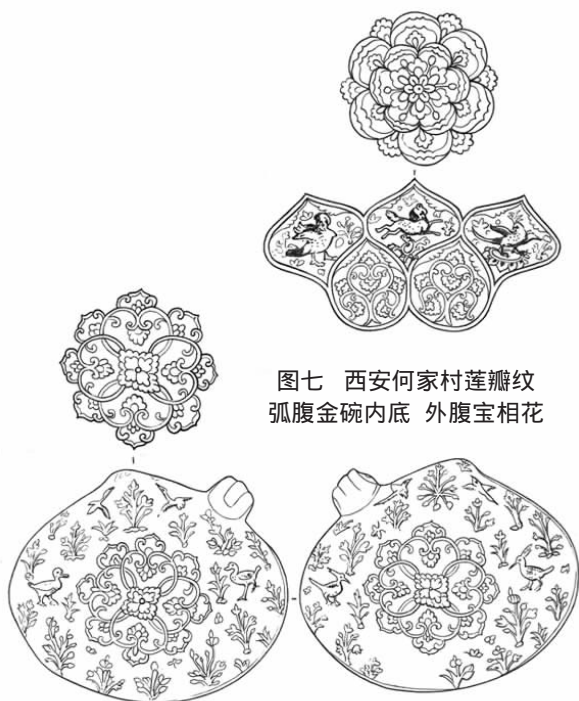
例二 河南偃师杏园李景由墓^[9]六边形金花银盒
李景由下葬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生前任蒲州猗氏县令，六边形金花银盒盒盖中心嵌刻六角形宝相花，每一个花瓣由对卷忍冬叶加云气纹



图四 唐薛徽墓
石刻宝相花



图五 偃师杏园
李景由墓六边形金花银盒



图七 西安何家村莲瓣纹
弧腹金碗内底 外腹宝相花

图六 偃师杏园
李景由墓蛤形银盒宝相花



图八 西安何家村
折枝纹圆底银碗内底纹样



图九 日本白鹤
蛤形银盒表面纹样



图一〇 日本白鹤
莲瓣纹弧腹金碗外腹宝相花



图一一 日本
白鹤蛤形银盒表面纹样



图一二 西安
何家村银耳环内底纹样

组成,中心用写实牡丹,整体观察又像莲花。外围用缠枝忍冬加云气纹组成六个外瓣,与银盒的六边形极为吻合,又形成一组宝相花纹样。构思精妙,工艺娴熟。银盒底部的花纹样与盒盖大致相仿,但花纹中心的宝相花写实部位用六出莲瓣替代,与外轮廓的六边图形十分协调(图五),独具匠心,确实是宝相花纹样中的突出代表。

例三 河南偃师杏园李景由墓蛤形金花银盒

与前例金花银盒同出一墓。蛤形银盒上下两瓣,中间有环轴相连。主题图形为八出尖瓣宝相花,由对卷忍冬叶、云气纹和缠枝忍冬纹组成,中心写实部分纹样似石榴花,主题纹样周围还嵌刻对鸟纹、鸿雁纹,图形极为恬静和谐(图六)。

例四 西安何家村莲瓣纹弧腹金碗^[10]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金碗应为典型的盛唐时期精品,嵌刻极为精细。碗中央为一朵六出圆瓣宝相花,由忍冬叶、云朵纹组成,花心为复瓣的石榴花。六瓣花之间加饰小云朵纹。金碗的腹外又嵌出两层精美莲瓣纹,花瓣内嵌刻鸾鸟、瑞兽和缠枝忍冬纹,如将莲瓣纹图案展开,又恰似一朵充满动感的宝相花,构图之富丽,设计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图七)。

除以上四例之外,盛唐金银器中宝相花的珍品尚有许多,如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的宝相花瑞鸟熏球^[11],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唐鸳鸯双鱼宝相洗纹饰^[12],以及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几件银盒(图八至图一三)等,都是极佳的对比标本。

3. 衰变时期

宝相花纹样盛唐时期达到巅峰,但不过百年,中晚唐时期,随着王朝的几次变革,宝相花几成绝响,即使发现三两件,也早已失去其端庄富贵的奢华纹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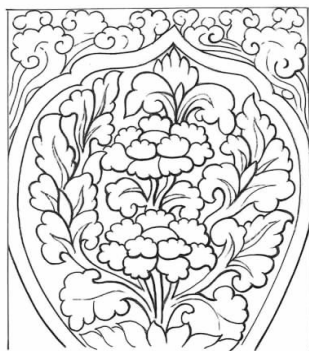
在宋代众多的石刻装饰图案中,巩县宋陵石雕纹样的几幅宝相花^[13],很值得我们关注。它们不再使用写真的对卷忍冬来勾勒莲瓣状外轮廓,更多使用的是大叶纹、云气纹以及写真的石榴花、牡丹花来勾勒图形,仅仅在众多的云气纹中残存一些宝相花的痕迹,与唐代严格意义上的宝相花不可同日而语(图一四至图一七)。

在宋《营造法式》中规定了宝相花图形,宋代织锦中也有一种被称之为宝相锦的织品,但它们与考古学认定的宝相花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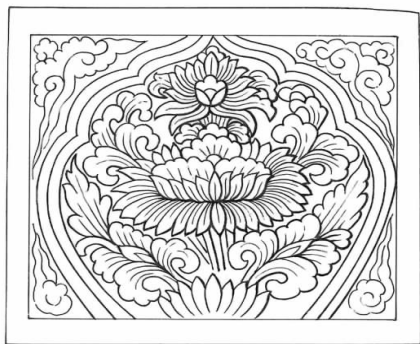
元代的装饰图案中也不乏宝相花的优美图形,



图一三 西安
何家村银香囊宝相花纹样



图一四 宋永昭
陵望柱基部宝相花



图一五 宋永厚
陵望柱基部宝相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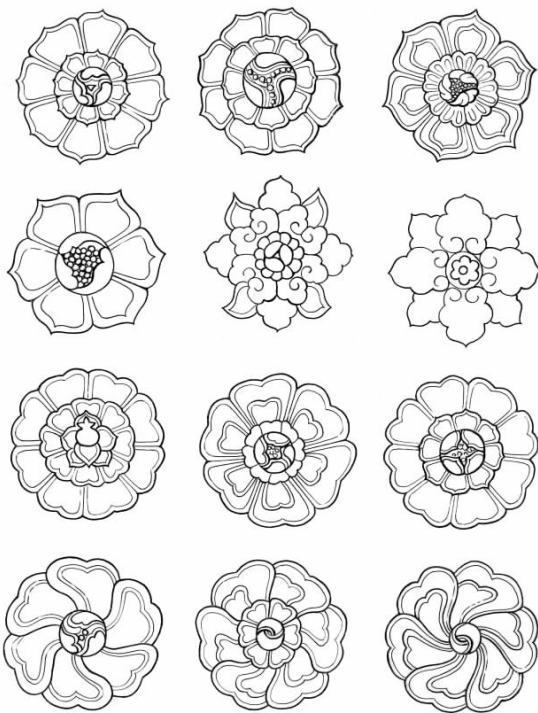
它们的整体图形近于莲花,花瓣更加多变,尖瓣圆瓣同时使用,图案化方面则更加明显,只是一种平面规矩的图形,全无雍容华贵的特质,应是宝相花



图一六 宋永裕
陵望柱基部宝相花



图一七 宋曹后陵望柱
缠枝海石榴宝相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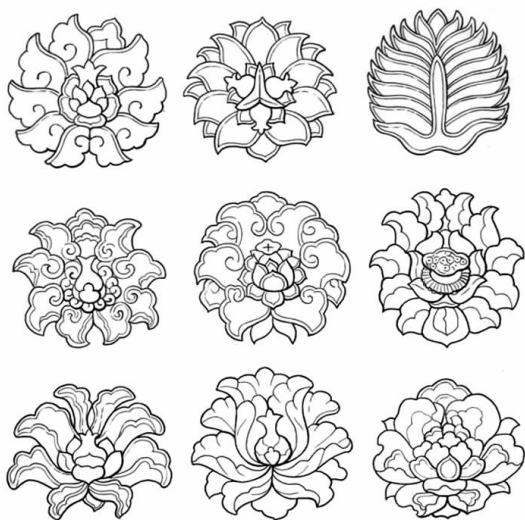


图一八 北京
居庸关元代石刻宝相花

的衰变时期(图一八、图一九)。此后的明清建筑中也偶见身影,但与唐代宝相花已无法相比。

有关宝相花的文献记载

一提“宝相”二字,相关学者都会联想到《全北齐文》的一条记述。北齐邢子才《文襄王帝金象铭》:“妙形难象,至理希诠。形之所及,理亦在焉。悟兹空假,劳此盖缠。式图往秘,用结来缘。丹青并饰,金玉同镌。神仪内莹,宝相外宣。圆光照耀,映波无边。……感发大乾,钟福旒纛,其永如天。归庆怙恃,寿等南



图一九 北京
居庸关元代石刻宝相花

山。凡厥亲类 宜其永年。归诚妙觉 标志上玄。托铭斯在 旷劫方传。^[14]”文中虽有“宝相”二字,但反复吟咏原文,“宝相”二字似不是形容笔墨丹青,更像是颂扬帝王金象气宇轩昂和奢华尊贵。

另一条稍早文献也值得关注:南朝梁王申《头陀寺碑文》:“飞阁逶迤,下临无地,夕露为蛛网,朝霞为丹,九衢之草千计,四照之花万品。崖谷共清,风泉相浹,金资宝相,永藉闲安,息心了义,终焉游集。^[15]”文中的“金资宝相”似在盛赞佛祖如来之金光照耀,犹如汇聚了无数珍宝,好像也与丹青粉墨无涉。

宋元时期宝相花装饰纹样已登堂入室,石刻、织锦不乏宝相花身影。司马光《三月三十日偶成兼呈真率诸公》诗:“宝相锦铺架,酴醾雪拥檐,沼萍浮钿靥,林笋露犀尖。”直指织锦。《元史·舆服志》:“士卒袍,制以绢,绘宝相花。”亦可为证。

余 语

宝相花图案是目前中国考古学界对唐代独具特色一种纹样的约定俗成的称谓。

宝相一词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最初用以歌颂佛祖金光照耀,法力无边,或颂扬帝王金光四射,高贵神仪。宋元时期,宝相花已程式化进入建筑、丝织、雕刻诸多领域,但与考古学所界定的宝相花不属同一范畴。

宝相花图案的出现与佛教关系密切,它是隋唐时期工匠、艺人们想象力和审美创造力的具体体现。它优美的图象里蕴涵着深刻的佛学内涵,它以

圣洁的莲花为主要造型依据,吸收了汉晋以来传统的云气纹图样,融入了中亚地域特色的缠枝忍冬和海石榴等形象,极富大唐气韵的个性图案,充分体现了大唐帝国雄视八方,吞吐万象的恢弘气势,成为我国文化史上融古贯今、惠内秀外、镶金嵌玉的艺术瑰宝。

[1]《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文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3]徐殿魁《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7]《山西博物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代薛徽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10]陕西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11]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

[12]张广立《中国古代青铜金银器纹饰》,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

[13]张广立《宋陵石雕纹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10月。

[14]《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全北齐文》卷三,原文又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七,内典下寺碑。

[15]《文选》卷第五十九,碑文下墓志《头陀寺碑文》。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运城市河东博物馆)